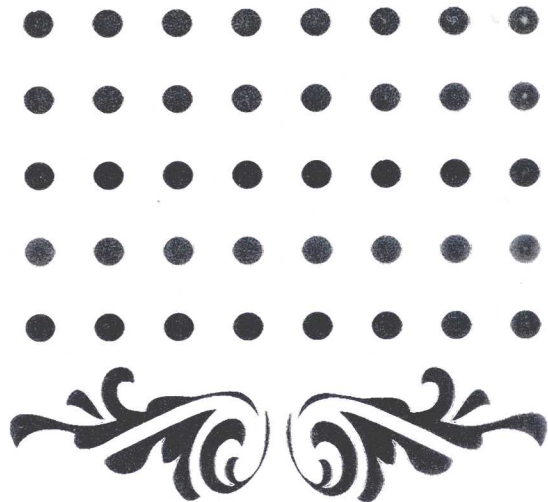


政治学学术经典译丛



韦伯

政治著作选

WEIBO ZHENGZHI
ZHUZUO XUAN

[德] 马克斯·韦伯 著
[英] 彼得·拉斯曼 罗纳德·斯佩尔斯 编
阎克文 译

東方出版社

政治学学术经典译丛

韦伯政治 著作选

WEIBO ZHENGZHI
ZHUZHO XUAN

[德] 马克斯·韦伯 著
[英] 彼得·拉斯曼 罗纳德·斯佩尔斯 编
阎克文 译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韦伯政治著作选/(德)韦伯著;(英)拉斯曼、(英)斯佩尔斯编;阎克文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9

ISBN 978-7-5060-3595-8

I. 韦… II. ①韦…②拉…③斯…④阎… III. 韦伯, M. (1864~1920)
-政治理论 IV. D095.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30460 号

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Texts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Edited by Peter Lassman and Ronald Spei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韦伯政治著作选

WEIBO ZHENGZHI ZHUZUO XUAN

(德)韦伯 著;(英)拉斯曼、(英)斯佩尔斯 编;阎克文 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3.25

字数:360 千字

ISBN 978-7-5060-3595-8 定价:4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出版说明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 - 1920），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社会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也是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极为重要的创始人之一，他所创立的社会学体系和研究方法对当代政治社会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韦伯毕生都在关怀政治事件和政治事务。他是西方政治学界成就卓著者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人物之一，在西方政治学理论和思想的发展史上具有着重要地位。本政治著作选收录了韦伯在政治领域的绝大部分重点著作，基本上反映出韦伯政治学的主要概念、理论、方法和体系，可以了解和研究现代西方政治社会学提供一个具代表性的文本。

但韦伯的政治学说和诸多结论也无可避免地带有他那个时代的烙印。在收入本著作选中的个别文章中，韦伯表达了自己对马克思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其中的一些观点、说法表现出其在立场和认识上与许多西方知识分子一样难以克服的局限，这些观点和说法是我们所不能认同的，希望读者在阅读时注意分析和鉴别。

东方出版社

二〇〇九年九月

韦伯眼中的政治

(中译者前言)

马克斯·韦伯的政治论说，也像他的整个著述体系一样并非一套玄奥之学。这对韦伯政治观的解读者而言，无疑算是一种幸运，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的逻辑脉络中几乎找不到可供随意挥发、最终有可能导致理解歧义的余地，更不至于像卢梭的政治思考那样有时竟能悲惨地被演绎到完全相反的方向上去。

举凡政治思考，恐怕都会首先面临一个基本的事实判断问题，即政治本身究竟是什么。自亚里士多德以降，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一直就不绝如缕，但唯有进入现代以后，即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答案才逐渐变得简明清晰起来，而韦伯的回答则使一切花里胡哨、拐弯抹角的说辞都成了多余，可谓毫无悬念：政治就是指争取分享权力或对权力分配的影响力，无论那是发生在国家之间还是发生在一国之内的群体之间。^{*} 根据韦伯的这个定义，不言而喻，政治本身始终意味着就是一种谋求权力或影响权力的活动；反过来说，我们甚至可以一劳永逸地认为，如果措意政治却又讳言权力，追逐政治却又淡泊权力（或者装作淡泊权力），都不过是标准的自欺欺人。

这仅仅是个起点，接下来还有一系列事实判断要作。首先是“权力”概念的所指。我们在《经济与社会》中可以看到一个严谨的社会学定义：“行动者将会处在一个能够不顾他人的反对去贯彻自身意志的地位上的或然性”（*Economy and Society*, edited by G. Roth and C. Wittic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 53），亦即“某人或某些人在社会行动中不顾该行动其他参与

^{*} 参阅原著第311页，下文援引原著正文时仅注明页码，即本书正文的边码，余同。——中译者注

者的反对而实现自身意志的机会”（*Economy and Society*, p. 926）。这个定义看上去波澜不惊，无非是明确指出了权力的维度，同时表明了政治的公共性质。不过，一个关键问题由此也顺理成章地登上了前台：权力的永恒魅力和巨大能量归根结底是靠什么手段支撑的？在韦伯看来，这根本无需哲学论证或者逻辑推理，直接陈述历史事实即可，那就是物理的暴力。在现代以前，它是一种来源相当多样的“常规手段”（从家长、族长直到形形色色的联合体或共同体都可能是它的来源），进入现代之后，它就只有一个来源了——国家，其间的差别在于，现代国家“在一定领土之内（成功地）宣布了对正当使用物理暴力的垄断权，……任何其他联合体或个人使用物理暴力的权利，只限于国家允许的范围之内。国家被认为是暴力使用‘权’的唯一来源。”（pp. 310-311）当然，从理论上说，作为理性化进程的结果，在现代文明形态的社会结构中，“暴力并不是国家使用的常规手段或唯一手段，这一点毫无疑问；然而，暴力却是国家特有的手段。”（p. 310）至此，韦伯便道出了“政治”的完整本相：谋求或影响以暴力为终极后盾的权力。无疑，这仅仅是个事实判断，但同样无疑，这也是一切“政治”的原点。只有紧紧盯着这个原点，才能接着有的放矢地谈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政治的意义和目的。

这样一看，事情就比较清楚了：我们日常用语中的“政治”，实际上类似于一个缩略语，多数情况下指的是“政治”的意义和目的，而这个所指归根结底是在追问：谋求或影响以暴力为终极后盾的权力究竟是为了什么？但这就进入了价值判断的领域。不言而喻，问题的复杂性主要就是出现在这个领域，其中的关键在于，它要求人们不得不正视权力的价值目标和暴力的道德性质，而且迫使人们必须决定自己如何进行选择。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韦伯几乎毕其一生都认为，“一切政治的本质就是冲突”（p. 173），即选择的冲突，或者说，价值的冲突。现代民族国家的情况尤其如此，无论是在它的内部还是外部。

由此便不难理解，作为德意志民族主义者，韦伯何以始终念念不忘的就是德国人如何在“世界政治”这个舞台上安身立命。但不言而喻，韦伯的意义却远不止于这种合乎潮流的民族主义情怀，而且，令同时代人常感意外的是，他毫不掩饰对那种偏狭、浅薄、虚妄的“民族主义”喧嚣的鄙夷和厌恶，因

为，不管那是自发的还是被操纵的，背后总有国家主义势力、阶级、政党甚或小集团的私利魅影。一言以蔽之，韦伯的民族主义是理性主义的，而这种理性主义就体现在他一以贯之的价值立场中——德意志民族必须在宪政框架中建构自由主义的公民社会，才能有望走向“政治成熟”，也才能有望以“主宰者民族”（Herrenvolk）* 的资格参与“世界政治”。（p. 129）

从这部文集的字里行间可以明确无误地看出，“政治成熟”的问题始终是韦伯政治思考中的头等关切，尽管其中的大量篇幅是针对德意志民族的当下表现进行的技术性分析论述，但至为重要的是，他所秉持的价值立场的普适性，无疑并不仅仅局限于那个民族本身和那个历史时段。

衡量一个民族的“政治成熟性”，韦伯着眼的“并不是某些人、某些阶级碰巧在某一时期进行统治的日常政治，而是整个民族的永久性权力政治的利益”（p. 16），在现代民族国家，这个意义上的政治成熟就意味着“对民族的永久性经济和政治权力利益的领悟，以及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些利益置于任何其他考虑之上的能力”（pp. 20 - 21），即使在“经济的发展开始超出国界产生出一种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新世纪，这个标准也仍是不容置疑的，而且理应成为一种本能（pp. 15 - 16），唯其如此，一个民族才不至于被内在的价值冲突迫使或诱使去舍本逐末。同时，韦伯还断然否定了经济发展会促使一个政治幼稚的民族自动走向政治成熟的可能性，他的分析使人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就像财产本身不可能自动生成财产权一样，经济发展固然有助于推动政治进程，但这根本就不是个经济问题。那么，有谁具备以及如何具备这种“政治本能”？韦伯毫不含糊地认为，那只能是一个自由的民族，一个抱有“永恒的坚定意志不再像一群羔羊一般被统治”的民族。（p. 69）当然，韦伯绝不是个政治浪漫主义者，他看得很清楚，即便在一个自由的民族中，这种政治本能通常也只是“沉淀在大众的无意识层次”，它必须通过“经济与政治领导阶层”得到自觉体现，因为，这种阶层理应承担一种特殊功能，“就是要成为民族政治目标感的担纲者，事实上，这是证明他们的存在价值的唯一政治理由。”

* 关于这个翻译成非德语文字很容易造成误解的德语概念，请参阅原著第 129 页英译者脚注，另见第 269 页韦伯本人的评述。——中译者注

(p. 21) 俾斯麦的威权主义统治留下了一笔能让我们感到似曾相识的政治遗产——德意志民族迅速地成长为一个骄横的经济巨人，但也同样迅速地沦落为一个猥琐的精神侏儒，这使韦伯确信，可以预见到的德国未来将凶多吉少。一个没有自由政治、缺少价值关怀的大规模现代国家，只是揣着大把来历不明或不雅的银子漫无头绪地得过且过，将随时都有可能一头栽入政治深渊。因此，韦伯明确警告他的同胞，寻求未来的出路，最关键的并不是两眼紧盯着“被统治者的经济处境”，而是要不断拷问“统治阶级和上升阶级的政治资格”。(p. 26) 我们已经知道，韦伯对德意志统治阶级发出的诅咒，不幸曾一语成谶。这会令人不由得想到，在现代民族国家，如果仍然空谈“社稷兴亡、匹夫有责”之类的政治逻辑，就实在是本末倒置了，换句话说，即便匹夫有责，责亦在于要求自由地表达相反的政治诉求：“匹夫兴亡、社稷有责”。“德国议会与政府”、“德国的选举权与民主”、“帝国的总统”、“俄国的立宪民主形势”等文便集中论述了威权主义国家的这种变革路径，即实现平等公民权，摈弃歧视性选举制度，有效推进议会制生活，让官僚机器回归它的工具性，总之，厉行宪政民主，迫使“政治”这个天生疑似的江洋大盗尽可能遵守合乎理性的规则，直至“盗亦有道”成为常识与常规，只有在这种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不例外的政治教育过程中，一个民族才有希望生发出在世界上安身立命的政治大智慧，这样的民族就断不至于误把练达苟苟蝇营的“潜规则”当做政治成熟。

事在人为。谈政治就不能不谈政治人。有关政治人的论说已不知凡几。但韦伯的著名演讲“以政治为业”，即便在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源远流长的西方政治学说史上，无疑也是独具匠心的重要文献。尽管不难看出当时欧洲的强权政治背景对韦伯的影响，然而，韦伯那种冷峻的客观精神却始终不为所动，这使他对政治人的剖视具有了无可辩驳的普遍意义。他对政治人的二分法，即可奉为圭臬，这一点已是广为人知。一类是“靠政治为生”，另一类则是“为政治而生”。他们都可能“以政治为业”，尽管两者的行为方式未必总是截然分明，但精神本质却不可同日而语。前一种情况下，政治人多以政治为职业，也就是靠政治混碗饭吃，无论那饭是寒酸还是阔绰、是洁净还是齷齪，也无论那吃相是高雅还是下作，终归是把政治当成了食槽子；相应地，“只有在后一种情况

下，他才能成为一个具有崇高境界的政治家”（p. 190），因为，这种人是“以政治为志业，是把从事政治当做一种使命的召唤。毋庸置疑，韦伯这里谈论政治家的“崇高境界”，当然不是对他们进行简单的道德评价，而是说他们具有三种“前提性的”素质，这些素质对于有权参与转动历史车轮的人来说是决定性的——“激情、责任感和眼光”（p. 352），这种激情是真诚投身于一项事业的观念激情，与癡病性的浪漫主义亢奋毫不相干，这使他们与常人有别，与政治官僚、行政专家和政治半吊子有别；他们知道自己是在上帝与恶魔之间纵横捭阖，没有理由奢望借助权力去冒充天使或圣徒，同时更没有理由堕落到滥用暴力去掩饰弱智、怯懦和虚荣，无疑，在一个已被除魅的世界上，“政治不是一桩伦理买卖，但是，羞耻心和正派做人的义务还是有一道底线的，不能突破这个底线而不受惩罚，即使在政治上也不例外”（p. 83），因此，他们知道，必须随时准备面对手段和目的之间那种固有的紧张关系，这意味着他们必须竭尽全力把握“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的平衡，或者说，必须为自己的行动后果承担责任，韦伯铿然指出，“这需要眼光”。而且，唯有将这三种素质熔铸在同一个灵魂中，才能造就一副政治家不可或缺的强大政治人格。（p. 353）不过，我们可以注意到，归根结底，韦伯念兹在兹的仍然是，只有一个自由的民族，一个“习惯于通过它的当选代表为自己的政治命运共同负责”的民族（“毕竟，这是一个民族有可能在政治眼光方面得到训练的唯一途经”）（p. 144），才能锤炼和选择出“为政治而生”的政治家以担负民族政治的领导权，且不管这当下的现实多么愚陋不堪。

不必讳言，韦伯的政治思考对于我们来说仍是一笔尚待挖掘的资源性遗产，如果放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乃至《经济与社会》的宏大思想背景下来看，本书各篇章历久常新的客观价值就更是显而易见，想必读者会有公论。

另外，笔者感到有义务特别说明一下，本书始末的两个名篇早已有精彩中译，即甘阳等译“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和学兄冯克利先生所译“以政治为业”，笔者本想择一正当取巧之道，恳请他们授权原文照搬，且克利仁兄事先已慨然应允；不过最终，因考虑到应尽量忠实于英译文本的原貌，遂放弃了照

搬诸贤中译的打算，但仍然仔细品味了他们的译笔，不少地方还是感到亦步亦趋为好，然后按照我对英译语境的理解移入拙译，掠人之美，笔者自当心存感激，如有鲁鱼之误，则定是笔者舛谬，唯竭诚祈待方家教正。

最后应作一点纯技术性的说明。本书的注释均为脚注，以阿拉伯数字排序者为英译者注，以大写英文字母排序者为韦伯原注。因这些注释已相当完备，中译者仅补充了若干，以星号标示并注明，希望不是添足之笔，祈读者亮察。

阎克文 谨识

2008年12月10日

英译者鸣谢

整理一位像马克斯·韦伯这样学问渊博者的著述，很快就会令人意识到自身知识的局限性，并要恳请更有见识的同道给予帮助。我们由衷地感谢从兰开斯特大学政治系哈罗·霍普夫（Harro Hopfl）、俄国与东欧研究中心墨林·佩里叶（Maureen Perrie）、伯明翰大学历史学院詹斯·鲁尔卡斯腾（Jens Rohrkasten）和德语系伯纳德·斯坦德林（Bernard Standring）各位那里得到的细致帮助，以及伯明翰大学德语系和政治科学与国际研究所同事们给予的总体支持、建议和批评。对于达勒姆大学爱尔兰文·维洛迪（Irvin Velody）在初期规划阶段给予的建议，也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英译者序

卡尔·埃米尔·马克西米连·韦伯 1864 年出生于爱尔福特。他的父亲老马克斯·韦伯是个律师，并在 1868—1882 年和 1884—1897 年间担任民族自由党的普鲁士下院议员。他在 1872 到 1884 年间还是德国国会议员。韦伯的母亲海伦妮·法伦斯坦·韦伯，对宗教问题与社会改革却抱有与丈夫不同的关切。

韦伯在柏林的家吸引了大批学者和政治家，包括冯·本尼希森、狄尔泰、特奥多尔·蒙森与特赖奇克。在家中进行的讨论必定给少年韦伯留下了强烈印象。1882 年韦伯开始了在海德堡大学的学业。他的主修科目是法律，但他也听政治经济学、史学、哲学及神学的课程。1883 年他迁至斯特拉斯堡，一边服兵役一边在大学读书。1884 年韦伯回到柏林继续他的学业，仍然读法律，其中还听过祁克的德国法律史课程。特赖奇克的讲座没有给韦伯留下什么印象，因为它们充满了极端民族主义味道，他认为那不过是些鼓惑宣传。大学毕业后，韦伯没有找到足够令人兴奋的法律实践机会，便继续进行政治科学以及法律史和经济史的研究。

1889 年，韦伯提交了一篇题目略嫌冗长的博士论文，“家族性公开贸易公司中的连带责任与资金独立以及意大利诸城邦的贸易共同体”。论文随后成了 vii 一部著作的一章，书名为“论中世纪贸易公司史——以南欧原始资料为基础”，并于同年出版。后来韦伯在 1891 年发表了大学执教资格论文（Habilitationsschrift，获得德国大学教授资格必需具备更高学位），“论罗马农业史及其对宪法与民法的重要性”。在这期间，韦伯参与了福音派社会代表大会的活动，与弗里德利希·纽曼结下了私谊，后者是基督教社会运动领袖和民族社会联盟（Nationalsozialer Verein）的创始人。

1892年，韦伯发表了由该联盟发起的一项调查得出的结果：“德国易北河东部地区农业工人的状况”。这项庞大的研究具有可观的政治意义。它的主题引起了很大争议——保卫德国文化免受斯拉夫人、主要是波兰人的“渗透”。同一年，韦伯成了罗马法与商法讲师，次年，普鲁士文化部长阿尔特霍夫下令，韦伯在柏林获任商法与日耳曼法教授。然而，1894年韦伯去了弗赖堡大学，接受了那里的政治经济学教席，本书收入的文章《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即为他的就职演说。演说也引起了高度争议，这是韦伯有意为之的。他曾愉快地提到他的观点之“粗暴”所引起的“震惊”。

韦伯1896年离开弗赖堡前去海德堡接替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卡尔·克尼斯就任政治科学教授。尽管韦伯对克尼斯的作品多有批评，但他本人的学术研究遵循的也是德国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派”所代表的同一传统。韦伯在海德堡的同事是宪法学教授格奥尔格·耶利内克与神学家和哲学家厄恩斯特·特勒奇，前者在1900年发表了《国家通论》一书。他们两人都对韦伯的思想方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值得顺便提到的是，韦伯在海德堡期间曾支持招收了第一批女研究生，其中就包括埃尔泽·冯·李希特霍芬，她的妹妹弗里达1912年嫁给了D. H. 劳伦斯）。

viii

随着1897年父亲的去世，韦伯进入了一个以深度抑郁为标志的精神疾病时期。为了矫治这种症状，他开始了四处漫游，特别是到意大利，结果是韦伯最终恢复了持续广泛阅读的能力。由于无力履行教授之责，韦伯1903年从海德堡辞职。然而，在这同时，韦伯进入了一个创造力更新期，开始了一系列关于方法论问题的著述以及后来结集发表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系列文章的写作。

1904年，韦伯与埃德加·贾菲和沃纳·松巴特一起成为《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献》编辑，该刊物声明，其宗旨之一是探究“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意义”。同年韦伯访问了美国，这使他获得了对于急速的工业发展所带来的文化与政治结果的直接认识。他应邀在圣路易的世界博览会上发表了演说，但他利用这次机会在美国进行了广泛游历。

1905年革命的爆发使韦伯的注意力突然集中到了俄国那里。他在三个月内就学会了读俄语并能跟上俄语报刊报道的事件进程。在《论俄国的立宪民

主形势》这篇长文（本书收入了它的绝大部分内容）以及同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俄国向冒牌立宪的过渡》中，他讨论了俄国社会、政治与文化背景中资本主义工业的最新发展可能带来的政治结果。

1909年，韦伯担任了规划中的“国民经济学”百科全书（《国民经济学概览》）的编者，他本人的撰著——《经济学、社会秩序与权力》——是其中的一卷，他去世之后在1921年出版时定名为《经济与社会》，原来的题目成了副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其后的岁月中，韦伯一方面推进这项规划，一方面集中对世界上各主要宗教的经济伦理进行了比较研究。这期间他继续生活在海德堡，他在那里的家成了一个思想交锋的中心，其中的常客包括卡尔·雅斯贝尔斯、沃纳·松巴克、厄恩斯特·特勒尔奇、格奥尔格·耶利内克、格奥尔格·齐美尔以及格奥尔格·卢卡奇。

1914年时，尽管韦伯对于外交政策走向持有强烈的保留态度，但他最初还是受到了普遍狂热的裹挟。随着战争的进展，他又恢复了自己特有的那种客观意识，公开反对德国政府宣称的战争目标，反对一切在欧洲进行领土兼并的政策建议。在韦伯看来，强化潜艇战的决定就足以表明德国政策不负责任的性质。这种政策最有可能的后果就是招致美国参战，前景肯定是德国的战败。在此期间，韦伯继续他的学术工作，完成并发表了关于世界诸宗教的专论，同时还接受了维也纳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席。

1918年底韦伯回到慕尼黑，怀着绝望的情绪观察了德国的革命。他把这场革命称之为“血腥的狂欢”，它在德国战败的关头只能是削弱德国。1919年，韦伯踏入政治舞台的努力未能奏效，他作为国民大会民主党候选人的提名被党的官员否决。然而，韦伯以非官方的身份参与审议了未来宪法的性质，并短期参与了凡尔赛和谈代表团。曾有计划让韦伯担任内务部长，但却无果而终。他对新生的共和国持有保留态度，但正如本书中的论文所示，他坚决认为，为了这个民族的未来，共和国必须有效运转起来。

应慕尼黑大学学生之邀，韦伯分别在1917年11月和1919年1月发表了“Wissenschaft als Beruf”（《以学术为业》）与“Politik als Beruf”（《以政治为业》）这两篇著名演说。它们遭到了右翼学生组织的示威抗议。1920年夏，韦伯因肺炎辞世。

马克斯·韦伯曾经写道，“政治”是他的“秘密情人”。他毕生都在关心政治事务。韦伯常常感到自己被投身学术和投入政治这两种彼此冲突的需求所撕裂。可以认为，政治关切贯穿于他的全部学术研究之中，只有这些关切赋予了后者统一的主题，但许多解释者却不得其门而入。韦伯政治思想的重要性和原创性有时会被一些评论所遮蔽，它们把他的研究描述为是对一种避开政治论战的现代社会科学作出的相当直接的贡献。

这里汇集的论文和演说具有一种双重性。尽管它们都是缘起于当下的事件和问题，但又超出当下的背景进行了更广泛的思考。这部政治著作选基本上适合于希望了解韦伯对当代世界的看法的任何人阅读。对德国政治命运的关切是所有这些文论的一个参照点。即便是讨论德国政治的命运，不管多么紧扣德国的主题，也始终关系到我们对现代西方国家政治的基本认识。

由于韦伯的政治著作选横跨了大约 25 年，因此完全能够想见，它们展示了观念的某些发展变化。例如，他在就职演说中关于种族差异的说法，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就被放弃了，而且明确指出种族概念毫无说明性价值。另一方面，那篇演说的核心要点，即政治斗争的不可避免性，在他的所有著作中都是一个不变的主题。

对于韦伯来说，重要的问题并不是人民在物质上的安乐，而是在任何特定经济与社会秩序中的人类品质。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工作，目的就是要培育“我们认为构成了我们人性之伟大与高贵的那些素质”。(p. 15) 我们不应忽略的事实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与人类及其生存品质有关。韦伯以强有力的表达方式指出，在他看来，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乃是如下经典意义上的政治科学：“它是政治的仆人，而这里所说的政治并不是某些人、某些阶级碰巧在某一时期进行统治的日常政治，而是整个民族的永久性权力政治的利益。”(p. 16) 韦伯的思想和表述特别结合了达尔文、尼采和马克思的成分，强调了国家、人民与阶级之间冲突与选择的不可避免性和必要性。尽管韦伯在这里表明他可以像马克思那样进行“唯物主义”分析，但韦伯与马克思的关键差异在于，韦伯认为，未来不会出现斗争将宣告结束这样的乌托邦。无休止的斗争就是我们的命运，我们的品格是否有力量，端赖我们是否能够抛弃幻想勇敢面对这一事实。

韦伯对政治生活的看法是高度悲观的。“我们传给子孙后代的并不是和平及人间乐园，而是为保存和提高我们民族的物种质量进行的**永恒斗争**”。(p. 16) 韦伯专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为了完成与他在弗赖堡的教职有关的学术职责，1895年时他对这门学科还只有有限的了解。他接受了当时经济界的流行观点，把它看做不断斗争以对付匮乏的学科。但是，韦伯已经看到，经济竞争也是“**权力斗争**”。国家就是“**民族权力的世俗组织**”(p. 17)，保存民族权力为经济政策提供了终极准则。

有报道称（是否确凿不得而知），韦伯曾说过，马克思和尼采都是十分重要的现代思想者。尽管韦伯既不是尼采的信徒也不是马克思的门生，但他钦佩这两位思想家。他本人思想的原创性就来自与这些彼此竞争的声音的对话，来自对它们的密集研究和批判性地保持距离。尽管他的思想肯定不是仅仅受到他们的影响（狄尔泰、李凯尔特以及齐美尔关于历史与文化知识的性质的哲学研究具有核心的重要性，路德的《圣经》也有显而易见的影晌），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影响，他的许多核心主题就是不可想象的。新近统一的德国那种格外迅猛的后发工业化问题，使得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问题成了韦伯那一代人的核心关切。社会主义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出现，迫使整个社会、尤其是学术界不仅要详细审视“社会问题”，而且还要评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主张。同时，尼采的激进精英论则被许多韦伯的同时代人看做“划时代的地震”。尼采是那些面对衰落与颓废去看待欧洲社会与文化变革的思想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这种前景来看，社会主义乃是现代隐忧症（modern malaise）的一种症状而不是治疗方法，它所承诺的进步观仅仅是一种疲惫不堪的文明产生的错觉。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包含的许多主题将贯穿于韦伯后来的著作。像他常做的那样，韦伯在这里也是从考虑“枯燥无味的事实”开始。然后他扩大了讨论范围以使他的主题所揭示的意义远远超出引起他思考的当下原因。演说一开始，他概括了最近对1892到1895年间普鲁士东部各省农业劳工状况的调查结果。韦伯给这个农业问题装载了大量的政治火药并毫不犹豫地投入了争论。结果是立即引起了激烈论战。韦伯描述的德国民族国家正在面对其他民族国家进行一场“永无和平可言”的“经济的生死斗争”。(p. 14) 德国与波兰农业工人在东部各省的状况和移民问题是当务之急。韦伯坚决认为，这个经济

问题必须从政治角度去看。韦伯认识到，如果普鲁士土地贵族（容克）阶级的经济利益与德意志民族在东部各省的政治利益产生了明显的矛盾，后者必须毫不含糊地被优先考虑。

为了领会韦伯的论点，就必须从当时与德国作为一个工业化国家的未来这个问题有关的争论着眼。韦伯认为，德国未来的发展除了工业化以外没有其他可取的路径。然而，这种工业化未来要付出某些代价。这意味着社会关系的性质尤其要首先在农村发生变革。它们将远离比较个人化的家长制生产关系进入资本主义原则基础上组织起来的非个人的生产关系。韦伯既没有加入工业化的反对者行列，也不是毫无保留地欢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他的观点是，德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的未来，需要它欣然接受工业化、不能怀恋已经逝去的“共同体”旧梦。此外，更加根本的是，一切都要取决于这个民族为它急剧增长的人口提供食物的能力。

xiii

然而，韦伯主要关心的既不是农业政策本身、也不是经济局势的细节。他的兴趣焦点在于这些发展态势将给民族利益带来的后果。但是，如果认为韦伯仅仅提出了一些当时常见的民族主义观念，那就错了。他不是把国家权力看做目的本身，他关心的是民族的命运。在韦伯看来，核心问题是政治领导权问题。哪个阶级或阶层能够承担得起民族的领导权？韦伯对此表示了悲观。现阶段的德国还没有哪个阶级的政治成熟达到了足以担当这个角色的程度。

在这个就职演说中，韦伯描述了各民族之间正在进行的一场无情的选择过程。然而，最令人焦虑的是，谁也无法保证从这个过程中脱颖而出的胜利者既是经济上最发达的民族又是最高度发展的“人类形态”。在提出这个论点时，已被任为政治经济学教授的韦伯也参与了关于经济思想的性质和局限的争论，这场争论造成了德国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派的分裂。对人类事务进行经济说明的性质和价值问题，成了当时德国史学研究的核心定见。韦伯抨击了他所说的这种发明“普遍幸福的药方”的“庸俗政治经济学概念”。他承认经济学概念在说明人类行为时的一般价值，但同时也强调指出了它们的局限性。政治问题决不应被简化为经济问题。政治领域是个自治的领域。

韦伯对政治的性质所作的说明，与他对德国在权力国家林立的世界中所处地位的看法密切相关。他的早期著作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学家持有相同的观点，